认缴登记资本制下债权人利益的 均衡保护

蒋建湘 李依伦

(中南大学法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内容提要:在认缴登记资本制度下,注册资本担保功能的丧失、认缴登记制对债权的阻碍以及股东自治权利扩张对债权人利益的挤占,使得对债权人利益进行均衡保护成为必需。其具体方式包括:强化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降低公司资产信息不对称给债权人带来的风险和加强公司对债权人社会责任的承担。

关键词:认缴登记资本制 债权人利益 均衡保护
DOI:10.16092/j.cnki.1001-618x.2015.01.005

一、问题的提出:认缴登记资本制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冲击

公司制度的精髓在于股东有限责任。可以说,股东有限责任是整个公司制度乃至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相比之下,债权人利益居于次位。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2014年3月1日正式实施。本次修订主要体现为对公司资本制度的重大调整,将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资本制。然而,本次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在给予股东更多自治空间的同时,并未对债权人利益予以均衡保护,在对法律平衡价值的追求上有失偏颇。

(一) 注册资本担保功能丧失

历史地看,公司资本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债权人提供担保。不过,注册资本的担保功能天生就不健全。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公司资

本制度非但没有很好地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反而由于股东虚报资本、抽逃出资等现象的层出不穷对债权人权益的实现造成了阻碍。由于该担保财产(股东出资)的所有权由公司享有,且其四大权能的实现几乎不受公司外部人的约束,使得债权人的担保权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在此意义上,无论在何种公司资本制度下,实缴资本均不能为实现债权提供有效的担保。基于此,法定资本制与折中资本制下注册资本的担保功能逐渐淡出。况且,由于法定资本制和折中资本制抑制了市场自治,其最终被授权资本制和认缴登记制所取代。然而,在认缴登记制下,由于注册资本的担保功能被完全否定,其结果对债权人就更为不利。因为,对债权人而言,一个天生不健全的注册资本担保总比没有任何担保要好。

作者简介:蒋建湘(1965—),男,汉族,湖南宁乡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依伦(1985—),男,汉族,陕西宝鸡人,中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二) 认缴登记制可能阻碍对债权的保障

在认缴登记资本制下,认缴资本并不需要一次缴清。在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而股东的出资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债权人利益保护将陷于窘境。设想一极端情形:自然人认缴出资100万元,分两次缴清,公司设立时缴纳10万元,70年后缴纳剩余的90万元,在公司成立后第3年,负有对债权人90万元的债务,双方约定2年后还款付息,第4年公司资不抵债申请破产。此时,即使管理人依据《破产法》第35条^①要求出资人补缴剩余的90万元出资,债权人也只能作为普通债权人参与剩余财产分配,仅就70年的缴资安排而言,其对自然人股东也是难以履行完毕的。也就是说,由于股东可以自由对缴资进行安排,实缴资本可能已经随着公司经营在不断损耗减少,而待缴资本却因未到缴纳期限而尚未成为公司实际资产,如此形成的资产真空必然会威胁到债权人安全。

(三) 股东自治权利扩大带来的债权人利益挤占效应

认缴登记资本作为最为和缓的公司资本制度,其核心价值是个人本位,以给股东提供最大的活动空间为己任,目的是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框架内,为私人秩序提供最大的回旋余地。^② 认缴登记资本制意味着股东自治权利的扩大。在对商法强制性规范分类中,除部分国家介入型强制性规范是公法规范外,自治型和国家确认型商法强制性规范均属于商主体自治范畴。^③ 纵观各国立法例,国外公司法对于公司转投资、股份折价发行和公司自持股票的限制越来越少,^④ 这一系列立法理念的变化,是对股东自治权利日趋重视的结果。然而,在股东自治权利扩大的同时,债权人利益可能被扩张的股东利益所挤占。易言之,出资人存在用尽其

在公司中享有的各种控制权的道德风险,尽量向债权人转嫁风险,甚至以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方式来获益。^⑤

在现行认缴登记资本制度下,注册资本担保功能的丧失、认缴登记制对债权的阻碍和股东自治权利扩张挤占债权人利益等多重影响,使得对债权人利益进行均衡保护成为必需。

二、强化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我国公司法对人格否认制度采取类似侵权立法式的表述,即倘若股东以公司为工具,实施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则股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此次公司法修订之前,立法仅将逃废债务作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侵权行为”。在认缴登记资本下,随着股东自治权利范围的扩大,股东可利用的手段不再限于逃废债务。公司在转投资比例限制、股份折价发行、自持股份以及减资退股等方面也必将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显然,在股东与公司拥有更多自治权的同时,也必将带来更大的道德风险。因此,应当适当扩大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防控股东自治权利滥用,保护债权人利益。

(一) 细化资本显著不足标准

在早已实行授权资本制的美国,立法规定若股东通过一笔很小的资金设立一个规模巨大、经营风险很高的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则资本显著不足将构成揭开公司面纱的理由。在我国,将资本显著不足确立为人格否认情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公司法实践中的各种事件表明,即使是在原来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和折中的资本制下,股东尚且能想尽办法抽逃出资,甚至虚假出资,那么,在认缴制实行初期,股东对公司的投入更有可能掺有水分。因此,当公司因资本显著不足,难以维持正常运营时,股东应当

① 《企业破产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② 郭富青:《公司资本制度设计理念与功能变革》,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1期,第9页。

③ 蒋建湘:《商法强制性规范的类型、性质与边界》,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7期,第51-57页。

④ 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121页。

⑤ 朱慈蕴:《公司资本理念与债权人利益保护》,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第127页。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从这层意义上讲,资本显著不足标准也起到督促股东按照资本充实原则良好履行缴资义务的积极作用。

公司资本不足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判断:其一,考察公司设立时股东投入的资本是否充足,包括股东出资数量、是否真实、是否足额等。当然,在认缴登记资本制下,该出资是指认缴而实缴的出资。其二,考察公司运营中财产是否不当地向股东流动。如果发现公司股东有抽回股本或者变相抽回股本之行为,则可以判断公司资本不足而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负责。对于股东抽回或者变相抽回出资,需要特别强调关联交易的审查应是考察重点,因为这通常是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掏空公司财产的一个重要管道。^⑥

(二) 确立人格混同标准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也出现了许多巨无霸式的集团公司或跨国公司。在集团内部,由于整体利益的需要,关联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往往十分紧密。对人格混同的判定稍有不慎,就可能对企业集团产生巨大负面影响,所以在司法过程中应当慎之又慎。在各国法院之裁判中,有一个决定性因素贯穿所有人格否认之裁判类型,即控制与支配的因素。^⑦ 具体而言,人格混同必须达到难以区分公司与股东、难以区分公司间独立性的程度,方可认定公司人格混同。美国法院对 *United States v. Dallas Liquor Warehous No. 4* 案^⑧ 的判决体现了这种谨慎态度。

我国《公司法》对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过于概括,对人格混同的认定标准、人格否认后的责任规定不明确,常常让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

知所措。因此,应当对人格混同标准予以确立和细化。首先,要考虑混同的财产、人员和业务等因素,在认定人格混同程度时,一般要求至少满足两个以上的因素才能认定达到混同的程度。其次,要考虑混同的时间长短。若混同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可以认为公司与股东间的混同程度高。再次,尽管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人事混同等三类情形是认定公司人格混同时常见且易于把握的标准,具有基础性和普适性,但必须同时考虑到人格混同形式的多样性。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个案应当秉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Substance Over Form Principle*),更多地对交易事项的商业实质和经济现实进行分析判断,而非仅由它们的法律形式进行认定。

(三) 人格否认中发挥待缴资本的担保功能

人格否认的适用意味由股东来承担公司的责任。然而,股东可以以先行缴纳待缴资本的方式承担责任。在认缴登记资本制下,分期缴足出资是常见现象。对债权人而言,尽管公司当前可能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但由于股东尚有待缴资本,因而其可以预期从该待缴资本中受偿。由此可见,在债权人与公司所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背后,隐藏着其与股东的隐性合同关系,这一合同即“以股东待缴资本额为担保财产的担保合同”。在这一债权债务关系中,公司为主债务人,与债权人存在隐性担保合同的股东为次债务人。一般情况下,主债务人违约,债权人只能等到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才能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这有可能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及风险,且与《担保法》的立法目的相悖。因此,在公司构成违约时,应排除担保人

^⑥ 朱慈蕴:《资本不足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适用》, <http://china.findlaw.cn/gongsifalv/qyj/gsrq/112509.html>, 访问日期:2014年8月10日。

^⑦ See *Harvard Law Review* See Association, Note, "Piercing the Corporate Law Veil: the Alter Ego Doctrine under Federal Common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 95(1982), p. 856.

^⑧ 被告为规避当时行业救济法规规定,同时设立了四个业务相同但形式上彼此独立的小公司,后法官以公司的设置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可能发生的契约责任或侵权赔偿责任为由否认了各个公司法律主体的独立性,将这些公司视为一个企业实体来追究企业整体责任。具体案例见: *State et al. v. Dallas Liquor Warehous.*, 147 Tex. 495, 217S. W. 2d654 (1949).

(股东)的期间利益,由股东以先行缴纳待缴资本的方式承担责任。另外,从商业实践上看,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必然导致公司经营不能,此时应提前缴资以充实公司资产,维护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三、降低公司资产信息不对称给债权人带来的风险

(一)认缴登记资本制下降低公司资产信息不对称的意义

在法定资本制和折中资本制下,立法者通过公司资本制度对债权人风险进行控制,即采取以提供公司“资本担保”的方式,在债权人和公司之间分配风险。随着公司资本制度的进化,公司注册资本在认缴资本制下的担保功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司实际资产。然而公司资产并不是“资产负债表右平衡式下所有者权益栏下列示的一个人为的法律创设的数字”,^⑨而是随着公司的经营活动在时刻变化。显然,以价值不确定的公司资产为债权人利益提供担保,自然难以起到应有效果。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出发,债权人必然希望依公司资产(担保财产)的动态变化实时调整合同内容,甚至会考虑在每次公司资产发生变动时重新签订合同,而不是选择订立持续性合同。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债权人唯一理性的选择是在持续性合同中尽可能多地约束各种不利于债权实现的因素。那么,如何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实现保护债权的目的,就成了债权人利益保障的核心问题——公司资产信息披露制度恰恰使之成为可能——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在制度上为债权人获知公司资产状况提供可行路径。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还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自我治理、自我监督的功能。

(二)降低公司资产信息不对称的途径

《公司法》仅规定了在公司合并、分立、减资和清算等阶段向债权人进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如此简略的规定不足以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以及参与权,有限责任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1. 实行公司注册资本额和实缴资本额的先期披露制度。注册资本额为初筛辨识潜在交易对象提供了虽然精度不佳但直观快速的低成本手段。^⑩在股东的缴资义务尚未完全履行完毕时,如果债权人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公司的认缴与实缴资本信息,就能够防患于未然。因此,为降低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首先应当将公司注册资本额和实缴资本额信息向债权人披露。这种公司注册资本额和实缴资本额的先期披露,也是对理性债权人的教育,帮助债权人真正成长。

2. 建立统一信息查询制度。除了对公司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的先期了解,债权人还有必要了解股东后续资本的缴纳情况,以及公司资产的变动状况信息。这要求建立统一的信息查询数据库。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碎片化现象,^⑪种类包括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企业质量信用网络、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办法、建设行业企业和人员档案等等。信息资源分布于各个行业部门,未能实现共享。这种现状不仅可能造成信用体系的重复建设,更可能增加债权人利益保护成本。因此,当务之急是整合现有资源,将资产结构信息、资产流动信息和资产状态信息等进行梳理比对,建立统一的企业信息查询数据库,供利害关系人(包括债权人)查询。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公司法》第6条第3款规定“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但是,我国一些地区的工商行政机关以“法院立案”作为限制条件,将工商信息查询限定在诉讼状态,事实上架空了《公司法》第6条

⑨ 李丽佳:《股东利益与债权人利益的帕累托最优设计》,载《中国商法评论》2006年卷,第87页。

⑩ 虽然当下的主流学术观点认为注册资本额与公司清偿能力无关,但在商业交往中,注册资本额仍是判断交易对象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即使在今天,公司的注册资本仍然是招投标的重要条件之一。

⑪ 刘俊海:《建议〈公司法〉与〈证券法〉联动修改》,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4期,第9页。

的相关规定。^⑩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行政部门提高查询门槛的做法本身就是徒增交易成本的反市场行为,不利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认缴登记资本制下,工商行政部门应当将企业信息以更加便利的低成本形式提供给公司利益相关人,以方便债权人及时准确地把握交易对象的资产状况,从而实现对债权人知情权的有效保护。

3. 强化中介机构人员的个人责任。在认缴登记资本制下,对公司实际资产的稽查审核直接关系到信息披露的质量。在市场诚信建设尚不完善、政府主导立法的模式下,由法律明确规定中介机构及其人员个人责任,对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包括债权人在内的一切公司相关利益人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公司法》第207条已对提供虚假材料、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规定了责令停业乃至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责任,同时也规定因其出具的评估结果、验资或者验证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外,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的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又对该法条作了司法解释。中介机构内部责任理论仍然是立法者与司法机关价值判断的基础。

然而,当前立法和司法解释忽视资本市场中中介人员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独特性。就世界范围而言,各国审计准则均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活动中保持应有的“执业判断力”和“职业谨慎态度”,一些日本学者甚至提出会计师应负“高度注意义务”。^⑪会计师未保持应有的职业关注即为过失,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应由其个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⑫随着公司法、证

券法等对公司中小投资者(包括债权投资人和股权投资人)保护力度的加大,对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利益过分关注必然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均衡保护。因此,应当明确中介机构人员也是单独成为过失侵害第三人民事权利的适格独立责任主体。一旦中介机构人员出具虚假财务报告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第三人可以中介机构和中介机构人员作为被告,主张其对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四、加强公司对债权人社会责任的承担

当下社会责任业已成为公司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广义上,公司社会责任的对象包括了债权人在内的一切公司利益相关者。在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强化公司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认缴登记资本制下强化公司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意义

同最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相对应的公司治理模式是股东中心主义。在这种资本制下,公司所需每份资产都来自于股东出资,股东自然享有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在公司存续期间,一切债权人及其他公司利益相关人保护问题主要由合同法和侵权法解决。受此影响,在严格法定资本制下,公司社会责任一般也不能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公司社会责任也是与折中资本制(2005年)同步引入公司法的。

在认缴登记资本制下,情况发生变化。一旦我们将公司视为一系列契约的结合,这个组织(公司)就解体成——投资者、经理、债权人、职员、供应商——通过协议在其间达成均衡。这也就是说,任何公司参与者,即使是股东也不能把自己当成是公司的所有者。^⑬由于认缴制的出现,股东更多地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出资人。

^⑩ 参见刘炜:《企业信息查询“紧箍咒”》,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2年6月18日第A05版。

^⑪ Lynn J. Mckell and Marshall Romney. *Journal of Accountancy*, 1997, 184:43.

^⑫ 彭真明:《论注册会计师不实财务报告的民事责任——法释[2007]12号评析》,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254页。

^⑬ Sharon Hannes, *The Role and Limits of Legal Regulation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part II): Article: Images of Organizations and Interfirm Externalities: A comment on Prof. Rubin,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July, 2005.

如果再考虑到可转换债券等特殊类型债券,股权和债权的分界就更加模糊了。股东在缴纳部分认缴出资额后,公司即可宣告成立并开展经营活动。^⑥经营活动带来的各种债权债务和股东后续依照公司章程缴纳的出资,共同构成了经济意义上的公司资产。比较常见的例子是银行向公司贷款。在借贷数额巨大,还款期限遥远的情况下,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必然对公司的经营投资项目,甚至减资、退股等事项进行约束。对于约束的性质,主流观点多从合同法意义出发,认为作为出借人的银行一旦将相应款项交付给公司,其对资金的所有权就蜕变为债权,风险大增,因而对公司行为作出诸多限制。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此种行为与股东以转移资金所有权为代价获得对公司控制权的本质差异并不大。这也正是德国将债权人作为公司的出资人而非债权人的基础。有资料显示,在德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以银行为代表的债权人持股比重占20.9%。^⑦无独有偶,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日本,私人持有股份及机构投资者持有股份均不足四分之一,其余为银行、公司法人所持有,占总量一半以上。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甚至有五分之一来自银行。^⑧

从国外立法看,采取授权资本制的美国公司法允许或要求公司董事行使职权时考虑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或公司决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⑨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也修改了其商事法律的相关内容,以法定形式确立了董事对债权人的义务和责任。2005年日本废除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日本商法》第266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人负连带损害赔偿赔偿责任。^⑩美日两国的立法例,从立法实践证明了对认缴登记资本制下强调公司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二)强化公司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路径

《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具有宣示性,极度缺乏可操作性。在采取认缴登记资本制后,与之相适应的修法活动并未及时进行,导致公司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存在约束乏力的问题。相反,相关立法还设置了公司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障碍。例如,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另外,《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银行等金融企业作为大多数公司最主要的债权人并无参与公司治理的理想管道。迄今为止,在公司正常经营状态下,尚无债权人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立法例。

1. 实现债权人对公司治理的参与。从比较法角度看,目前尚未有立法例允许债权人进入正常经营状态的公司参与治理,几乎所有破产法立法例均有如下规定:在公司拟破产清算中,由于公司内外部治理已经濒临崩溃,债权人此时即以债权人会议的形式直接参与公司重整清算等事项。看似截然相反的情况,恰恰是对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态调整。从我国公司治理现状看,在信息披露制度、职业经理人制度尚未有效建立时,债权人有转向公司内部治理寻求自身利益保障的诉求,立法者应对此种现实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公司外部治理环境转好后,对债权人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应做出

^⑥ 这种设立成功不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也是经济意义上的。譬如,一个注册资本100万元的咨询公司,可能仅在投入10万元租赁购买必备的办公场所与办公设备即可开展经营活动。

^⑦ 徐晓松:《论资本监管与公司治理》,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4期,第89页。

^⑧ 徐强胜:《银行对公司的相机治理机制研究》,载《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101页。

^⑨ 刘迎霜:《公司债:法理与制度》,法律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210页。

^⑩ 高向军、孙海龙:《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承担》,载《决策与信息》2008年第4期,第74页。

适当调整。

商法为自治法,各市场主体应当在商业活动中享有自治权利。当公司与债权人协议确定了公司有义务向债权人定期报告公司近况,列席股东会、董事会甚至约定债权人有权参与公司重要人事安排等内容时,司法机关在进行形式审查后应当确认协议效力以保护债权人权益。当然,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相当人合性,当有限公司股东会拒绝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时,司法机关应当以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宜判令公司支付违约金,而不是径行判令合同继续履行,以免破坏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危及整个公司制度。

2. 明确董事对于公司债权人的赔偿责任。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董事会对公司的决策、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这很可能诱发董事的道德风险,侵害债权人利益。若董事在管理公司事务时致使第三人受到损害,董事与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现代公司法发展的趋势。^①许多国家立法也均规定董事对债权人的民事责任。

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主要集中在董事对债权人的欺诈行为,以及公司濒临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所引起的民事责任。^②在大陆法系国家(地区),关于董事对债权人所负的民事责任,有相当部分是一般性规定。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3条规定,“公司之负责人对于公司业务之执行,如有违反法令致他人受损害时,对他人应与公司负连带赔偿之责。”韩国《商法》第401条第1款规定,“董事因恶意或重大过失懈怠其任务时,该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损害的责任”。通过立法规定董事对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有利于规制董事行为,保护债权人利益,使董事在决策时更加谨慎。

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二》规定了公司破产清算等特殊状态下董事对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赔偿责任,但未对公司正常经营状态下董事对债权人的义务进行规定。为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均衡保护,公司立法有必要规定,如果董事有恶意或者重大过失,违反法律规定或以其他不正当的方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应同公司一起对第三人(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On Balanced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Interest under Subscribed Registered Capital System

Jiang Jianxiang Li Yilun

Abstract: It's necessary to balanced protect creditors' interest when the assurance function of registered capital have lost, the subscribed registered capital system may damage creditors' rights, and the expanded shareholder's autonomic rights reduced the creditors' interest under the subscribed registered capital system. The measures of balanced protect include to intensif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system, to reduce the risk of creditors that come from information asymmetry of the corporation's capital,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rporation to assume CSR to creditors.

Keywords: subscribed registered capital system; creditors' interest; balanced protection

(责任编辑:刘宇琼)

① 梅慎实:《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43页。

② 葛伟军:《英国公司法原理与判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